

马航 MH17 背后有 10 个 7, 是纯粹巧合还是另有玄机? 为什么有人愿意将事件和所谓的神秘数字扯上关联, 或者更愿意相信灾难曾被预言过呢?

“7”的谜团

MH17 背后的数字

当全世界都在关注马航 MH17 击落谜团时, 社交网络上人们正在热议数字“7”的巧合。航班号 MH17, 波音 777, 交付日期为 1997 年 7 月 30 日, 当年首飞日期是 7 月 17 日, 坠落于 2014 年 7 月 17 日, 机龄恰好是 17 年!

此外, MH17 被击落的消息传出后, 一条发布于马航 MH370 客机失联第 21 天的微博“珍爱生命, 远离马航 MH17”被翻出并在网络空间热传, 有网友感到神奇——“竟然有人预测了这场空难!”

后来博主新荷兰中文网对此预测作出回应:“马航在荷兰地区的航线就是 MH17 和 MH16, 当时发微博是为了提醒荷兰地区的网友, 慎重选择马航航班。”

马航 MH17 背后有 10 个 7, 是纯粹巧合还是另有玄机? 在这一连串巧合发生时, 不少人感叹:“7 果然是个吉利数字啊!”而这样的言论随即招来了诸如“不尊重死者”的批评, 如果记者就曾评论说:“某些新闻报道的数字命理学是完全彻底地对人类生命的不尊重。”

那么, 为什么有人愿意将事件和所谓的神秘数字扯上关联, 或者更愿意相信灾难曾被预言过呢?

我们需要控制感

如果神秘数字真的有魔力, 如果真的有有人

能预言灾难, 那何尝不是一件大好事! 大不了我们尽最大努力避免不吉利数字, 对预言大师言听计从好了, 总比失去那么多的生命好太多了! 灾难若能被数字解读, 或被预言过, 最起码说明灾难事件具有一定的规律性, 危险是可规避的。然而现实却是, 在灾难面前, 在众多危险面前, 人们往往是缺乏控制感的。

MH17 背后的“7”引发了人们对不吉利数字的关注, 是因为人们倾向于为事情的发生寻找规则和原因——事情越是缺乏确定性, 人越需要找一个支点增强安全感和自信。

也许你会嘲笑别人对不吉利数字的迷信, 但看看下面的实验, 你会发现迷信是个通病, 染上它很容易。

首先, 先把鸽子饿 8 天(当然不能完全让它们滴水不进), 增强它们寻找食物的动机。然后, 在实验箱中安装食物发放器, 设定每隔 15 秒落下一个鸽子爱吃的食丸。接着每天单独把每只鸽子在实验箱中放置几分钟, 对其行为不作任何限制。

几天之后的发现会让你大跌眼镜: 在两次食丸落下的间隔内, 鸽子们形成了各自固定的行为模式: 在间隔时间内逆时针旋转 2~3 圈; 反复将头撞向箱子一角; 头部前伸, 连带着身体从右至左大幅度摇摆等等。

实际上, 鸽子的行为反应和是否得到食物、何时得到食物之间毫无关联。然而, 鸽子们却把

作为离退休人员, 我们已步入暮年, “中国梦”又是什么呢? 我们, 还有没有梦呢?

有梦想才会有希望

■何春藩

“现在, 大家都在讨论中国梦, 我以为,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就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这一出自习近平总书记之口的梦想宣言, 既是习近平总书记的“中国梦”, 也是每一个中国人继往开来的伟大梦想。

梦想是什么? 梦想是坚定的思想意识和目标追求, 梦想是坚持心中永不改变的信念。我们中华民族, 历来就是一个勇敢追逐梦想的民族, 历朝历代的仁人志士, 怀抱这一伟大的梦想, 这一坚定不移的信念, 创造了博大精深的灿烂文明。

在半导体研究所, 我们见证了黄昆、王守武、林兰英等老一辈科学家为了实现强我中华的梦想。在上世纪 50 年代, 国民生活还处于非常困难的情况下, 舍弃海外优厚生活回归祖国, 为发展新中国的科学事业奉献力量。他们在中国贫瘠的土地上, 不断地做梦, 又不断地将梦变为现实。

在那个年代, 我也亲眼见证了留苏归来的连志超, 为了研制出一种新型半导体材料, 因意外事故引起爆炸牺牲在实验室的工作台上。他为了实现新中国的科学梦、强国梦, 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

中华民族是一个命运共同体。在当今的中国, 国家理念与人民期盼同声相应, 个人梦想与民族梦想一脉相承。

我们每个人梦想的成长, 都与“中国梦”的

何谓创新?

中科院实施“知识创新工程”以来, “创新及其文化”一词是人们谈论最多的话题。

从古到今, 人类对创新内涵的理解是一致的, 那就是——“推陈出新, 充满生机”, 这是创新的要义, 也是创新的本质所在。

创新是综合因素的动态过程, 从科学研究的层面上说, 创新是智慧和实践的过程, 换言之, 创新是一种能力的过程。

创新能力核心是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尽情发挥。从理论上讲, 我们每个人都有创新能力, 大到惊天动地的创新, 小到“鸡毛蒜皮”式的创新, 都能为社会进步和民生产生重要的影响, 只是范围和程度不一样, 对社会和生活的影响的大小而言。创新是人类智慧所特有的特征, 是社会发展和进步不竭的动力。创新的魅力在于原创性和新颖性, 其中包括原创性和在此基础上创新性。

我们不难理解从诺贝尔奖到重大自然科学的发现, 从创新的自信与勇气到具体的科学实验, 从充分利用现有科学手段的应用到知识与积累的并用, 从创造良好的科研氛围到基地建设, 从科研体制创新到创新的科学管理, 无疑给我们展现出了一个个直观的“创新家园”, 值得我们学习和体会。

认识创新, 勇于创新, 是当今科技工作者的理念和责任。随着科技事业的发展, 能否保存持续不断的创新, 已经是衡量一个研究所乃至一名科技工作者能力的标准, 同时也是关系到一个研究所能否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方面。

所以, 我们要深刻地理解创新和认识创新, 不能只把创新挂在口头上, 要把创新的意思贯穿在整个科研活动实践中。也就是我们所说的

随着科技事业的发展, 能否保存持续不断的创新, 已经是衡量一个研究所乃至一名科技工作者能力的标准, 同时也是关系到一个研究所能否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方面。

创新与文化

■芦军 段立斌

“创新为本, 凝练出新”。

何谓创新文化?

关于什么是创新文化, 许多人都想得到一个明确的概念, 似乎一提到创新文化, 就能得到一个直观的答案, 我认为这是不可取的, 同样也不符合不断深化中的创新实践过程。

中科院建院 60 年多来, 为国家经济和国防建设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其中包含着许多优秀文化的传承。特别是实施“知识创新工程”以来, 中科院按照创新“三性贡献”的要求, 紧扣国家经济发展的主题, 从目标的凝练、机制的转换、社会的责任等方面, 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果, 令世人瞩目。

创新文化作为创新过程中综合的观念和行为方式, 其中包含着历史的传承、观念的因素、人才的使用、机制的创新、宏观管理和微观管理等诸多因素。我认为以下九个方面的因素, 是创新文化建设不可或缺的因素。

一是精神的因素。纵观中科院的发展历程, 有一笔极其宝贵的财富, 那就是浓缩着几代中科院人拼搏和无私奉献的精神, 而且根深蒂固



心理所供图

自己的某种行为与得到食物建立起了因果联系。

行为主义心理学大使斯金纳就是用这套简单的实验程序为我们饲养出了“迷信”的鸽子。把不可控的事情与可控的、稳定的东西联系起来——这就是人乃至其他动物增强控制感的方式。

文化不同, 不吉利数字也不同

有些数字之所以不吉利都是因为跟一些不好的事物联系在一起, 而不同文化下, 人们对数字赋予的含义不同, 荣登不吉利数字排行榜

的“选手们”也就不同。比如西方人忌讳 13, 就和他们“第十三个门徒”的基督教故事有关。而中国人忌讳 4, 是因为和汉字“死”谐音。

那 7 又招惹谁了? 话说在《易经》中, 7 为“艮”卦, “艮为山”, 有“抑止不顺”“止步不前”之意。可见迷信也是离不开生活的背景的。

这给我们一点提示: 数字吉不吉利不是铁打的事实, 而要看你引发怎样的联想。如果我们太过依靠吉利或不吉利数字带来的控制感, 那么不知不觉间我们已经被数字引发的联想控制住了。

(中科院心理所国民心理健康促进中心供稿)

的明天, 为了光荣的未来, 我虽已年过七旬, 但要做到人老心不老, 老有所为, 继续造福于社会, 要为建设“美丽中国”的梦想而奋斗。

尽管当前社会舆论多元、利益多元、价值观多元, 作为一名共产党员和一名老的党务工作者, 我有自己的价值取向和精神追求。虽然我退休了, 但要有党员的党性意识, 有“我是党员我骄傲”的荣誉感; 牢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 不忘共产党组织的先进性, 不忘共产党人的奉献精神; 在现代化建设的征途上, 在平凡的生活场所, 当好群众的贴心人, 多为群众排忧解难; 积极为离退休办公室当好参谋, 做他们开展活动的积极支持者、参与者和志愿者; 支持社区的工作, 维护社区的安定团结, 为建设和谐社会、和谐社会带好头, 服好务, 出好力。

我曾在党委办公室工作, 有一定的文字功底, 也乐于写东西。近些年来, 我曾参与了几次有关所史书籍的编著, 为几位老科学家写过传记。我要发扬自己的特长, 继续把这方面的工作做好、做到底, 要积极参加健身活动, 保持健康的身体和良好的心态, 少给单位、社区添麻烦……我的梦虽然渺小, 但我只认这个理: 我要在自己的平凡生活中, 树立好一个共产党员应有的形象, 使党的崇高形象矗立于人民群众的心中。

(作者单位: 中科院半导体所)

新工作之大忌。所以, 效益的因素, 将是创新文化建设的重要内涵。

六是环境的因素。营造一个适合创新和科研工作的好环境, 是创新文化建设的重要抓手。随着创新工作的深入开展, 我们需要包括人文、科研、创新条件, 以及园区在内的各种环境支持, 为创新和发展提供物质保障。

七是领导者的因素。创新目标确立之后, 领导者和带头人的统御能力, 沿着确定的目标, 使创新和科研工作取得成效, 就显得十分重要。创新实践证明, 一支优秀队伍, 必然要有一支集学术水平高、创新能力强和管理到位的“领导者群体”, 这是创新文化建设的组织保证。

八是管理的因素。建立健全科学和规范的管理方式, 使创新工作高效有序的开展, 是创新文化建设的重要支撑。在宏观管理方面, 要进行目标管理; 在微观管理方面, 要善于创造新的管理方法, 寻求更加合理有效的管理手段, 既是创新管理工作的要求, 也是对创新文化建设的极大丰富。

九是分配的因素。建立激励的分配政策, 充分调动各类人员的积极性, 是创新文化建设的有效手段。在科研和创新中, 只讲奉献, 不讲利益, 或者只注重利益, 轻视奉献, 都不符合改革和创新的要求。所以, 创新文化的建设要体现两者的相辅相成, 使创新和奉献、利益和分配始终相伴相随。

创新永远是人类获得精神和物质财富的路径, 所以说, 创新及其文化也永远没有“句号”。在探讨创新及其文化的时候, 更多的应将客观和主观结合起来, 理论和实践结合起来, 科学和社会结合起来, 生存和发展结合起来, 从而来凝练我们的创新目标, 实现我们的创新目标, 形成和发展我们的创新文化, 为建设有中科院特色的创新及其文化而努力。(作者单位: 中科院兰州化学物理所)

所刊

动物地理学是一门边缘性学科。在其发展历史中, 生物学对它的关注, 远比地理学要多。即使如此, 它在生物学中, 始终处于分类学的附属地位。动物学家进入动物地理学, 往往是不经心的。而在地理学中, 动物地理学则几乎是可有可无的遭遇。

当我的专业方向指定为从动物地理学结合综合自然地理时(1953年), 对这一情况, 我已有所了解。当时, 由于我们的自然区划工作有苏联专家参与, 得知在苏联科学院地理研究所设有生物地理室, 它立刻成了我的明灯。很快, 我从苏联专家那里就得到三大本被苏联称为经典的“野外工作指南”。“指南”对我当时在动物地理方面的工作, 有很大的帮助。

但是, 只要踏上草原或进入森林, 我就不由自主地陷入生物学问题的重围, 才真正领会动物学前辈向我说的“动物地理学家, 应该同时是动物学家”的含意。

我曾在北大听动物学课, 努力补充自己的不足。但客观现实令我认识到, 要在地理学领域内建立起属于动物学的阵地, 谈何容易! 连留苏归来学动物地理的同行, 都纷纷进了动物所。

当时地理所领导一度欲将我并入动物所(某分类室)时, 我没有意见。只是觉得我们已经打开了能看见动物世界的一扇窗子, 现在却要自己把它封上, 不禁不寒而栗。后来, 因动物所建议地理所应保留住这面旗帜而作罢。

边缘的处境与出路

我的工作, 要求我经常与动物学界合作。我与动物学同仁, 是战友又是对手。从地理系毕业又在地理所工作的我, 在动物学工作中可以发挥地理学的作用。我还了解到, 苏联科学院地理研究所生物地理室的出现, 当时主要是由于人事关系上的原因。然而, 在地理学环境里的生物学, 必然受到地理学的影响, 所以, 逐渐地显示出它的特色。

从注意动植物间的关系到综合考虑环境各个要素及地图的应用等, 推动了景观动物地理学与生物地理群落学在苏联的发展。当时(20世纪50年代)在我国, 自然地理区划的理论与方法, 推动了动物地理区划。这方面的成就, 得到动物学界的普遍认可。

显然, 出自地理学界的动物地理学成果, 能够得到动物学界的认可, 主要是由于地理学与动物学两者互补的创造性。这应该是边缘学科的优势。然而, 那时我面临的现实是课题和人才的难求。对于地理所的动物地理来说, 似乎走上了风雨飘忽的征途。

为找一条有利于动物地理学在地理学领域发展的新途径, 我在黄维维所长自然地理学三个过程的启示下, 选了土壤动物作为动物地理研究的对象。据欧洲和美国 20 世纪 60 年代资料估算, 土壤动物的生物量大约是当时全球 30 亿人类的 20 倍。换言之, 在陆地生物系统中生物量占首位的不是人类, 而是土壤中的动物。土壤动物是参与生态系统生物调节过程的重要成员。

后来(20世纪70年代中期), 国内动物学界主要是动物分类学界也开始注重土壤动物的研究。由中科院主持的“陆地生态系统定位研究”项目, 在东北长白山森林和内蒙草原建立的生态系统定位研究站, 欢迎地理所(组织有关单位)去开展土壤动物工作。后来, 又被纳入由土壤动物(分类)学家尹文英院士领导的“中国典型地带土壤动物研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课题。

误区与前景

欧洲一位著名土壤动物学家, 在欧洲第一次土壤动物学术会(1955)上说“土壤动物出现在土壤中是不幸的”。我费了许多时间琢磨其含义。首先是因为土壤环境特殊, 土壤动物种类又极其庞杂, 分类学(生物学研究的前提)及其他方面的研究, 均明显滞后。而土壤学家只忙于土壤学本身的问题。

动物地理学在研究物种分布格局及其过程时, 第一道“拦路虎”就是土壤动物分类, 影响了学科的进展。总的来说, 土壤动物学研究, 要求是多学科的, 碰到的困难也是多方面的。

土壤是三态多面高度异质的环境。动物学家往往限于专业基础或专业兴趣, 不识别或不注意不同土类及不同土层性状差异的重要性。以致在进行土壤动物采样时, 不愿采取按土壤自然剖面分层, 而人为规定分 0~5.5~10、10~15(毫米)三层。也许后者简单易行, 又见于日本动物学同行。这一做法, 广泛流行。

显然, 人为机械划分的三层, 不能代表土壤动物生活的自然环境。即使对此三层的理化等进行分析, 提供的只是对了解土壤动物生活环境无用的一堆错误的信息, 使工作受到损失。这是一个误区。我将此问题与张懿铨同志讨论时, 作为地理学家, 他完全同意这一看法。动物地理学是动物学研究的对象, 用地理学的理论方法进行研究的科学。从哲学上看, 在动物地理学的发展中, 地理学应该是主导。

从地理学来看, 土壤动物出现在土壤中是有幸的。它是土地的敏感指示器。土壤动物的分布规律及土壤动物的分解作用等信息, 对土地评价有重要的指示意义。在陆生脊椎动物中最低等的两栖类动物对环境的水分条件反应敏感, 受到水文地理学家的关注。我很高兴, 我所在土地覆被和生态水研究工作中, 已充分注意到动物这一要素, 有了动物地理学的内容。我向往的动物地理学前景, 已经展现。

(作者单位: 中科院地理资源研究所)

我与动物地理学: 困惑与向往

■张荣祖